

●管继平

■文人尺牍(九)

旧学者与新文化

——章太炎致易培基

都说民国时期是“大师云集”，然而彼时真正被大家尊为“大师”的还真不多，若有者，章太炎先生大概可算上一位。

章太炎先生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的朴学大师。所谓朴学，即上古朴质之学也，后泛指为儒家经学。梁启超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也就是说，传统之经学，到了章太炎这里基本可以“观止”矣。而且，章太炎学问之大，几乎是当时一批新旧学者人所佩服的，旧学者自然不必说，即便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尽管章太炎及其一帮弟子们，对胡适所推崇的白话文极尽嘲讽之辞，但胡适并不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否认太炎先生的学问，胡适在《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学问虽好，然而若要再拓开一新境则难矣。不过，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建之初，校长曹云祥原欲聘请胡适来主持国学研究院院务，胡适则认为，这院院长一职非国内学问顶尖的一流学者不可，自己不配，乃推荐了章太炎先生。虽章太炎后来也没就任，但可见胡适气度之大，对太炎先生的学问钦佩之深。

不过比学问更令人钦佩的，还有章太炎早期那种排满反清推行民主的革命精神。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是章太炎的弟子，对太炎先生的渊博学问以及斗士精神相当折服，称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五四”之后，章太炎的斗志渐渐消退，观念也慢慢落伍。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影响下，鲁迅不为尊者讳，撰文对章先生也有过批评。而当一九三六年，鲁迅闻听章太炎在苏州逝世的消息后，依然不顾自己的重病之身，抱病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文章写后也仅十天，鲁迅也遽然而逝。

鲁迅的这篇纪念文章非常著名，他专意凸出章太炎早年的革命经历，所以在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底，临总统之门，大话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不屈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写这些话，其实是大有深意的。虽其时民国已建，然民族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但太炎先生晚岁却自藏锋，作“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强调太炎先生的战斗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要昭示和提醒国人“革命并未成功”也。

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宣传革命和他提倡旧学并不冲突，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他思想渐趋保守，“粹然成为儒宗”，并公开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思想。如下一件函札，即一九二一年七月章太炎因易白沙之死写给其兄、也是学生易培基的一封信，信中涉及章氏对“新文化”的强烈不满，信后附其悼念易白沙的五言诗一首。

哀我兄左右：
前知白沙自戕，曾致一函，以志悲悼。近又接得手书，哀思未尽，作诗吊焉。新文化之误人，无旧学者得之，足以亡中国；有旧学者得之，足以戢一

身。然陈独秀辈贪污卑劣，外作大言，稍有知人之明者，窥之易了，而白沙竟未觉察。军伐武夫，土匪政客，其恶固多，然以独秀校之，则亦唯之与阿也。薰犹同器，以至自戕，不能不痛悼也，故吊词云尔。

章炳麟白
七月十一日

新会有大士，卜居近白沙。冥心契玄北，志欲陵云霞。藩袍在名节，吐辞无奇邪。若若四百载，名字何相若。探古诂黄农，视世如浮苴。南辕北有轡，啖此苦与荼。闻于私塾老，江门行无迹。荡荡旆旆材，齿颊流奇葩。钱刀敛狂拜，攫姐碎阿耶。兰游巴同御，岁晏谁为华。何不登阳春，輶袂而藏诸。冥名未即实，令人长咨嗟。

章炳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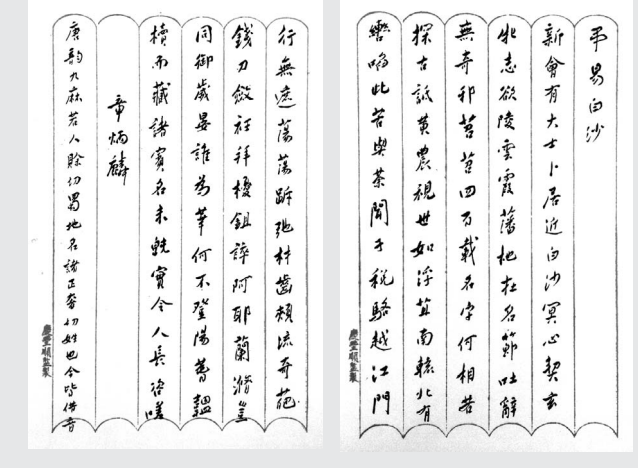
《唐韵·九麻》，若人除切，蜀地名，诸正奢切，姓也，今皆借音。

读此函，须先对易氏兄弟作一简介。

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曾于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课，并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一九一六年他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毛泽东是他班里的学生，后他又任湖南一师校长时，曾聘毛泽东为国学教员，且与毛过从甚密，予以毛很大的帮助。故宫博物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长。一九三三年，因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而蒙冤罹屈，被迫辞去院长之职。

信中提到的易白沙，乃易培基之弟，原名培荃，字越村，因仰慕明代思想家陈献章(陈献章在广东江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自己也正好出生于长沙南门外之白沙井，故改名白沙。易白自幼聪颖好学，少通儒家五经和《资治通鉴》，早年研究郑思肖《心史》及阅读黄宗羲、顾炎武著作，萌发反清思想。后参加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一九一六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人，揭开了五四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后面到国运不兴，他忧心如焚，曾孤身一人潜赴北京，欲谋刺北洋军阀头目未果。之后他又南下广州，面见孙中山，要求“组队赴北方杀贼”，党人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他顿感绝望，遂于一九二一年端午节渡船赴陈献章故乡新会县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仅三十五岁。

章太炎此函正是为凭吊易白沙之死，而致信给时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任上的易培基。在悼诗中把易白沙同于明代硕儒陈献章，对白沙之死寄予极大的惋惜。同时，章太炎将易白沙之死归咎于受“新文化”思想之毒害，他愤而斥道：“新文化之误人，无旧学者得之，足以亡中国；有旧学者



得之，足以戢一身。”显然，易白沙是“有旧学者”，故戕害了自己。举“新文化运动”大旗者乃陈独秀、胡适之流，章太炎在此还将陈独秀之危害，比作与军阀土匪相类，可见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痛恨之深也。

然而，信札读过，暂且撇开。在此，就章太炎的书法也同样颇多可观之处。章太炎精研小学，对文字他强调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据说北大教授、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行者刘半农有一次与章太炎谈白话文，自恃语音学的教授，谈到汉唐、明清时文字的音韵问题，却被章太炎问得张口结舌，章太炎随口即能以唐音来吟诵，或以明代的音韵背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刘半农闻之，只得败下阵来，暗自不得不佩服章太炎学问之博大。而章太炎书法就得益于其深厚的小学功底，他尤擅写篆书，除尺牍外，现留存的书法作品也以篆书为多。有笑话说他甚至开药方、写便条也常用篆体，为此也曾难倒了不少人。有一次他差仆人买肉作羹，仆人并不识字，拿了他的手书条子跑遍苏州城内各店肆，仍空手而归，回对主人说：“您写的东西，人家都说没有。”盖因他把“肉”字写成篆书的“月”字，难怪怪人打了“回票”。

旧时做学问者，必先从《说文》入手，所谓“读书须先识字”也。有文字记载称，太炎先生曾精读《说文》七十余篇，据说在苏州讲学时，他完全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只凭口诵手写，就能全文背诵《说文》和《尔雅》。所以，他的书法，多也是取自《说文》，不是单纯追求字型趣味，而是注重文体符合六书。即使在他的行楷书中，也不似常人那样从临习汉魏晋唐入手，他说自己的书法“取自款识”，即借鉴先秦铜器上的范铸文字，我们读他的尺牍体，似也可见其笔势蕴藉，线条圆融朴茂之韵。至于学书要诀，章太炎曾对学生说：“写隶书要写《石门颂》；魏碑要写《郑文公》；篆书不可不写《天发神谶碑》；先写这放纵、有力之体，方能真正放得开，而后写一些秀气、圆转之体，便可以收得住。”这番话其实很有见地，它不仅是在临帖的经验之谈，也道出了学习书法艺术须有个先放后收、先破再立的过程。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学问大、脾气也大那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正是由于学问通天，所以他说话行事常常出人意料、放诞不羁，世人无奈，故对其有“章疯子”之称，其“疯”者，或许也含有学问好得“发疯”之谓。章太炎一生做过许多怪事、狂事、逸事，然而有“疯子”之谓在先，他人又能如何计较呢？据说章太炎所学之深，难以盖测。其研究范围涉及经学、小学、历史、哲学、佛学、医学等等，著述宏富，仅医学上也有《霍乱论》、《瘵病新论》等。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其实是医学第一。”

这有点类似齐白石说自己“诗是第一”之味。学问大名气大之人往往如此，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可是什么都敢说。

第五号上：
张菊生太史(元济)，早岁清华，蜚声翰苑。戊戌政变，望名党籍，褫职南旋，一意从事教育。先总教南洋公学，继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培养新知，董理旧籍，孜孜不倦，四十年如一日。倭寇为虐，先生蜷伏沪上，清贫自矢，年届八旬，鬻书为活。曾有吴稚晖、张伯苓、王宠惠、钱新之、王世杰、陈布雷、黄炎培、王云五诸先生代定润格，早经公布，遐邇闻之。兹由总收件处参酌时价改定，摘要录后，另有详细润例，函索即寄：
楹联：四尺以内四万元、五尺以内五万元、六尺以内六万元、题跋加倍。
屏条：每条四尺以内四万元、五尺以内五万元、六尺以内六万元、三行为率。
扇面：跨行四万元、单行六万元。
以上色箋金笺加半、指明正楷加半、来文及其他点品加倍。
匾额：一尺以内每字三万元、尺半以内四万元；以上均散书、全幅整书加倍、题跋加倍。
润滋先惠、墨费加二、约期取件、加速另议。
我生也晚，要是我成长生活在那个年代，经济条件许可，是定要请张老先生写几幅字的。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著名的学者和出版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功成于商务印书馆，做过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最后担任了上海文史馆的馆长。张琬老师是张元济的孙女，最近由北京来上海小住，我就跟她说说，我是喜欢张老先生的字的，特别是信札随笔，行笔飘逸稳健，字字秀挺圆润，像他人那么儒雅。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尚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一次信封封成了“翻转信封”，张老先生将一寄给了沈信卿沈恩孚。

我还有一封张元济 1939 年写给汪懋晋的信，用得倒是“涵芬楼”的八行笺，这信著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里。汪懋晋是汪兆铭，晚清遗老，有学问，民国政府不知多少次请他出山为官他都辞了，一心只想效忠满清皇朝，他有个弟弟名气太大，是做了美国贼的汪精卫。元济先生在信中说：“懋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叠奉旧历正月二十日、二十六日又二月二十二日三次手教，展诵敬悉贵体违和，时患晕眩。比来想已康复，至为驰念。承

用。遂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了一份《张菊生太史元济书札润例》，除函请京、津、杭等商务印书馆分馆分发润例和代收信件，还由九华堂、荣宝斋、朵云轩等著名的字画店代为销售。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太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日。”虽说他常自谦“素不善书，深恐贻讥大雅”，但令他意外的是，由于他的科举辈份和社会声望，求字者居然不少。比如，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命书小笺，容再呈上。贵友余君嘏书小立轴，可以遵办。俟纸到即寄。附去润例祈转致。”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则提到自己鬻书数年，未柏庐的《治家格言》嘱书者已不下百数十通了。

老先生每隔几天写一次字，事前要磨许多墨，张琬老师为他的爷爷做过书童，一边看书，一边磨墨：“他是一个圆形大砚台，磨到墨汁很浓了，就倒入墨盂，然后再磨第二盂，至少存满两个盂墨盂的墨汁才够写一次字。”家里一张小小的老餐桌见证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她回忆：“祖父每次写大件的作品如对联等，都需要先把餐桌四周的台板撞起来成一大圆桌，他站在桌前挥毫泼墨，我或弟弟或其他人则站在桌子的另一面搭下手。他每写完一个字，我们就把纸往前拉一下，以便他再写第二个字。”人夙先生是张琬老师的弟弟，他记得他的爷爷有好多对大小不同的图章，视写件的尺幅而选用，每对章

第一枚是姓名，第二枚是“壬辰翰林”，而人夙先生当年最感兴趣的是一旁按老太爷的选择取出盒内的图章，轻轻地、均匀地蘸上印泥，再把图章交由老太爷钤盖。

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常常泡在上海图书馆翻老杂志、老期刊，抄名人卖字卖画的润格广告，期待编一本民国时期名人润格的辞典，抄了数十篇了，因沉湎艺术创作，这死功夫终究没再继续，不过资料中是记下了一则张元济的润例，刊登在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2007年1月，上海书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海派书法晋京展”。时隔八年，上海书协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海派书法进京展”。前者为“晋京”，后者为“进京”，“晋京”与“进京”，这一字之差却让笔者思考良久。

“晋”与“进”有区别吗？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对这两个字作了比较。“晋”，即“进”、“升”；而“进”，即“向前”、“前进”。两字同音均有“进”之意。但二者所“进”的指向有所不同。“进”与“退”相对，而“晋”常与“降”相对。有人说，“晋”是纵向之进，而“进”是横向之进。“晋”有明盛之意，有下级到上级、地方到中央之意，“晋京”也有骄傲、自豪之意味，就象天子召喚一样，有一种受约束之进，有所依附之进。而“进”有平等之意，一种努力之进。中国的汉字大多为象形文字，且寓意深刻。从“进”的篆书看，上为“隹”，形似小鸟，下为“止”(趾)，即鸟脚，意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而“晋”的篆书是从日从从，日出万物进。故“晋”与“进”其深层之意也是有区别的。将“晋京”改为“进京”，笔者以为这也是主办者深思熟虑的。

对于此次“进京展”，笔者曾撰写过一篇《从“你为谁点赞”说开去》，肯定了此次“进京展”许多改良之举，从动员到征稿，到评审，再到今天的公开“亮相”，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主办者的思想，体现着主办者的行为。或许“晋京”到“进京”就是一个标志性“转变”，传递着多重信号。笔者觉得这“一字之差”体现着“三个转变”。

一是观念的转变。常言，观念一变天地宽。观念转变了才能转变发展的思路，才能把创新的理念贯穿于我们的工作中。记得余秋雨先生曾对“二人转进京”与“徽班晋京”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二人转进京”和“徽班晋京”看上去有点像，其实恰相反。“徽班晋京”是一种民间的艺术要追求一种朝廷机制，非常想得到朝廷的关注。而“二人转进京”它是一种纯民间的移动，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叫做文化版图的移动。是为“进京”而非“晋京”也！据悉，今年是“徽班晋京”225周年，当地政府就此作了较大的“改变”，并以“新徽班进京”创作了徽戏《徽班进京》等剧目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等演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当然，此次“进京”与当年的“徽班晋京”全然不同，“晋”让位于“进”，用官方媒体之言，此次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群众共享的公益特色，让群众走进剧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把“晋”改为“进”，为的就是让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确，文化的背后是观念，艺术的发展实际上是艺术观念的转变。“晋京”与“进京”，虽仅有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关键词”的变化。笔者以为此次“海派书法进京展”也正是为了传承“海派”优秀文化艺术，突出文化公益和书法艺术交流与分享。

二是思路的转变。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转变思路，勇于创新”这是笔者对此次“进京展”的评价。从“进京展”的整个过程看，尤其是展览主题的确立，预示着一个成功展览的灵魂所在。当然，主题的确立取决于主办者对“信息”处理的水平与能力，将“晋”勇敢地改为“进京”，反映了此次展览的指导思想 and 目的的改变，也是主办者思想、观念、文化的充分体现。滚动一下，从“进京展”的启动，主办者就及时召开了专题动员会，明确其目的与意义；征稿时广而告之应征作者的条件与要求；征稿完成又邀请“国展”评委担任评委，而且从主席到普通会员一视同仁接受评审；评审结束后主事者又举办评委与作者“面对面”的书法创作座谈会，进一步完善作品的创作等。所有这些举动，都体现了主办者工作思路的转变。笔者估计主

办者在开幕前的几个月里都在“考量”：此展能否引起全国的关注，尤其是京味儿书家的关注？三是作风的转变。一位“海漂”作者对笔者说：“‘进京展’从动员到今天的开幕，体现了上海书协严谨、细致、民主的工作作风。”他说，以前“海漂”作者加入上海书协都很难，现在不一样了，像“进京展”这样的“大展”“海漂”作者入展也不少的。的确，这几年市文联、市书协给“海漂”书法家们提供了比较好的成长环境和展示平台，打破了过去那种身份与地域界限。

转变作风，还体现在主办者把“改作风”融入到策展、融入到评审、融入到开幕式。笔者曾与书协的有关人员闲聊过，也想知道他们策展的想法，他们认为“进京展”不是跟风展，我们不是去为了讨个好口彩，而是想实实在在地通过展览，恭请全国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为上海未来的书法创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更好地帮助上海作者找到自己存在的不足。真是难能可贵！此次“进京展”让笔者感到更为可圈可点的是此次展览没有举办所谓的“研讨会”。从目前全国大小书法展览看，已习惯于“展览+”了，举办一个展览总要召开一个配套的理论研讨会，因为研讨会可以得到“专家”们的首肯和表扬，同时，以显示展览的学术思想与价值，以再造“声势”。但是，此次“进京展”没有这样去做。

观其展，笔者感到此次“进京展”还有三大亮点：其一，此展可谓是一次主题性展览，大多作品都是根据《习近平用典》中的内容创作的，这也让笔者感受到上海书家基于时代、社会的创作态度。其二，为确保展览质量，在入展的数量上得以控制。此次“进京展”共展出作品140余件，与往届进京展在数量上减少了70余件。这可能也是不多见的，一般组织者都希望一年比一年入展多，一年比一年声势大，意在体现书法队伍的发展壮大，但此次展览严格按照评审标准，宁缺毋滥。其三，为“海漂”作者提供了展示平台。笔者在前面也提到主办者近年来对“海漂”作者的关心、关注，“海漂”作者成长，这里就不多言了。

展览理念与“进京展”思路的转换或者说萌发，预示上海书协未来之希望，如果说过去喜欢用“数字”说话，现在可能需要用“数据”思考了。随着“国展”新常态和以展览为主的书法发展模式的成熟，以及文化公益优先原则与开放的艺术交流格局的确立，笔者觉得“海派书法”正在呼唤着与它相适应的组织构成与管理机制。

记得在上届进京展的“汇报展”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主席在观展时强调：书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希望上海书法家为传承书法艺术、弘扬民族文化内涵、为挖掘城市文化底蕴、不断丰富城市文化内函、塑造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多作贡献。所以，笔者以为此次“进京展”也体现了主办者的思想跟进与文化自觉，体现了上海书协在新的文化大背景下勇于求变、求新、求实的进取精神和时代责任感。“进京展”是一次转变观念之举、寻找差距之举、提升水平之举。

“进京展”无疑是成功的，但它也经历了“好事多磨”。本原定于5月份展览的却因为有多项不可测的原因推迟到了9月份，而且，又在结束不久的十一届“国展”后举办这个展览，这本身就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考验”。一位研究幸运数字的人对笔者说，在9月举办这是一个难得的日子，“9”是一个幸运数，一个大爱数，“9”可以超越个人得失带来的喜怒哀乐，且将眼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宏观。也许！也许吧！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海上刀郎

■砚边杂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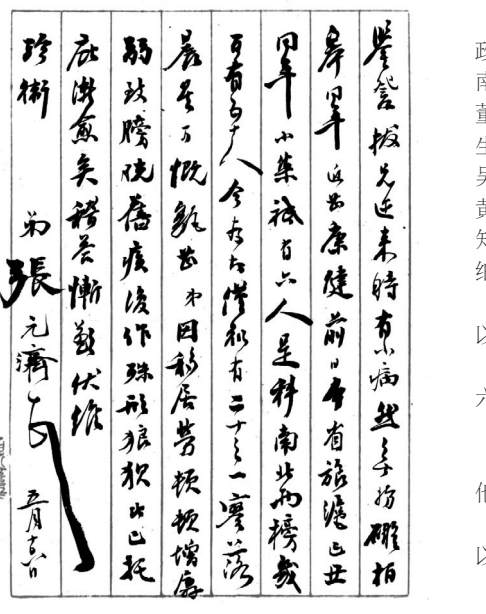
「晋京」与「进京」

●唐吉慧

张元济写字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

张元济先生一生崇俭朴，我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这类故事。以纸来说，大小纸片全部整理收起，用以写便条、记事、写信。老人平日交游广泛，每天会收到大量的信件，他将信封集中累积，每隔一段时间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所谓“翻转信封”，即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帖好，再次利用。我有两件张元济先生的信札，一件写给他的好友李拔可，信纸用的竟是著名植物学家钱海峰观光的讣告，追悼会筹备处请张老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上海虞洽卿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参与公祭。另一件写给著名的教育家沈恩孚，普普通通一页五行笺，内容没什么特别，信封是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正面贴有一枚中华民国时期面额半分的邮票，先是寄给李拔可，而后李拔可划了自己的名字寄于“张菊生先生台启”，最后